

《现代文选》函授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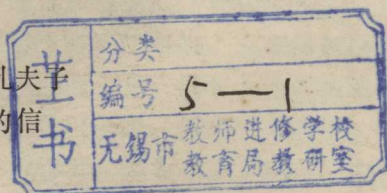
— 鲁迅杂文单元 —

目 录

一、鲁迅杂文概述

二、鲁迅杂文选读

- 1、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 2、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 3、“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 4、论“第三种人”
- 5、文章与题目
- 6、二丑艺术
- 7、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 8、答托洛斯基的信
- 9、半夏小集



三、鲁迅杂文分析练习：

看书琐记（三）

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组



一、鲁迅杂文概述

鲁迅的杂文，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前夕，作者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敌人冲锋陷阵的锐利武器，是作者参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战斗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是我们今天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深刻理解和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生动教材。在共产主义者鲁迅战斗的一生中，杂文是他全部著作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学遗产。

杂文，作为鲁迅独创的一种政治性与文艺性高度统一的特殊文体，是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为了适应政治斗争形势，紧密配合战斗任务而产生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所以鲁迅的杂文，是作者始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的时代产物。

鲁迅杂文，题材极其广泛，体裁也是多样化的。如按文体分类，则有政论、杂感、通讯、序跋、演讲、传记、随笔、日记等。如按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因为“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有利于“知人论世”，所以鲁迅的杂文都是按写作的年月编成集子的。

一

为了配合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各个阶段的斗争任务，鲁迅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所写的杂文，大致可以按照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分为前期和后期两大部分。前期的杂文包括从1918年到1927年的作品，收集在《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五本集子中。鲁迅前期杂文的战斗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复古主义者，拼命维护封建文化，认为“伦常不可铲，孔孟不同覆，文言不当废”，鲁迅尖锐地抨击这些复古派：“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想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这些人是“侮蔑尽现在”的“现在的屠杀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继林纾之后，又有提倡保存文言文反对白话的“学衡派”和“甲寅派”。他们表面上是要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鲁迅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批判这些提倡

文言，主张保存“国粹”的人，是一些“文且不通，理将安托”，“并主张也还不配”的家伙，“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他们的文字只能当作一纸讣文，公布文言文和“国粹”派的气绝罢了。（见《热风》中的《估学衡》和《华盖集》中的《答K S君》）

（二）对资产阶级买办文人“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五四初期，资产阶级右翼曾经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买办文人胡适、陈源之流，在五四后期，分化出来，创办《现代评论》刊物，反对宣传马列主义，主张多研究一些问题，并以青年导师自居，开列一大堆旧书目，要青年“踱进研究室”去“整理国故”，企图把青年引向脱离现实斗争的死胡同中去。他们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海外奇谈”，是“分裂和猜疑的现象”，诬蔑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兵的斗争是什么“打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对这些洋奴买办文人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不过是在为统治阶级“做戏”而已，其罪恶目的则是以“细腰蜂”的毒针，来麻痹人们的神经，以便为统治者制造驯服的奴才。针对胡适的反动目的，鲁迅在《青年必读书》的答问中，提出“不读或至少要少读中国书”的主张，因为“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并教导青年，不要去“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在世界上活下去，“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鲁迅并形象地讽刺胡适、陈源之流忠实地为帝国主义效劳，是率领胡羊走向屠场的“山羊”（《华盖集续

编·一点比喻》),是“媚态的猫”(《朝花夕拾·狗·猫·鼠》),是“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

(三)对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的揭发和斗争。五四以后,爆发了反帝斗争的“五卅”运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这时,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于革命进步力量,疯狂地进行镇压,其中以“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为最突出的事例。“女师大事件”是封建军阀势力与革命进步力量在教育阵地上一场剧烈的斗争。鲁迅这时写了《‘碰壁’之后》,《并非闲话》(一)、(二)、(三),《‘公理’的把戏》等锋利的杂文,猛烈地揭发了封建官僚章士钊及其爪牙迫害进步学生的罪行,并无情地抨击了《现代评论》派陈源之流制造流言蜚语,为反动势力帮凶的丑恶嘴脸。在“三·一八惨案”中,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很多徒手请愿的爱国学生,这种残酷的屠杀,引起了鲁迅无比愤怒和悲痛,先后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揭露三月十八日这一天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指出这不是事件的结束,而是人民反抗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勇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鲁迅前期的杂文,以发展的进化论思想为基础,配合着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任务,主要有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鲁迅还写了许多政论性的杂文,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家庭问题,儿童教育问题,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问题等,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也记录了作者的思想历程。当然,由于世界观还不是阶级论的局限性,使作者前期的杂

文还缺乏鲜明的阶级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表现在抽象笼统地批评所谓“国民性”，认为是中国人大多数固有的弱点，未明确这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长期麻醉统治的结果。又如对中医，对旧书和旧戏的看法也不是一分为二的，有否定一切的倾向。所有这些因局限性产生的弱点，在鲁迅成为阶级论者的后期的杂文中，都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鲁迅后期的杂文，包括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所写的作品。收集在《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三集，以及收集佚篇的《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十一本集子内。后期杂文的战斗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忠诚党的革命事业，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时期，正是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革命势力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时期。鲁迅在这浊浪排空的最黑暗的年代里，以杂文为武器，表现了忠诚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强的党性原则。“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这时鲁迅公开声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并再次称自己的文学活动是“遵命文学”，所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他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更自觉地做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小兵”。当抗日战争前夕，毛主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王明、刘少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破坏和干扰，受到托陈取消派的

攻击和诬蔑时，鲁迅立即站出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答托洛斯基的信》中，斥责托派的“高超理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表达了热情洋溢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公开声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又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明确地宣称：“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他并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在文艺界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的口号，批判了周扬为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而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一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

（二）批判文艺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提倡“革命文学”，高喊革命，空谈彻底的主义，并且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的“敌人”，进行围攻。在这次“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首先深刻地指出，从事“革命文学”的关键在于作者世界观的改造。他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革命文学》）其次，鲁迅指出“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错误，是执行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

他们，……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才子十流氓的毒。”鲁迅批判这些把革命和文学当作脚踏的两只船的投机家，“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这些人“激烈得快，也和平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以上引文均见《上海文艺之一瞥》）事实正是这样，当年空喊“革命”，“左”得出奇的王独清、张资平、叶灵凤、田汉、阳翰笙之流，在“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的时候，不是一个个都堕落成为托派、叛徒和汉奸了么！

从一九二七年到三十年代初期，极力推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伙人，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又追随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在文艺界狂热地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九三六年初，周扬为了推行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利用他在“左联”窃据的党团书记和文委书记的职位，以“领导者”的身份，先后抛出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等黑文，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宣扬不分阶级的“全中国民族的文学”，认为领导权、不必“强调地提出来”，“应该公平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肯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专有的”。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周扬等“四条汉子”在疯狂地吹捧“国防文学”的同时，还对反对这一口号的鲁迅“大布围剿阵”，诬蔑鲁迅不了解“现在基本的政策”，

是“宗派主义”，是“标新立异”，造谣说鲁迅已“转向”了南京，诬告鲁迅成了“托派”，甚至威胁要用“实际解决”。正在这关键时刻，共产主义者鲁迅，毅然决然地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站了出来，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著名的杂文，提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的口号，并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号。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对周扬提倡“国防文学”，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作了有力的抨击。鲁迅又严正地指出，新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扩大，……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这种“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了周扬提出的民族投降主义与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以致命的打击。鲁迅对自己提出的口号作了科学的阐述之后，又对周扬、徐懋庸之流的无耻诬蔑和诽谤作了有力的驳斥。首先驳斥所谓“宗派主义”，鲁迅指出“国防文学”的理论倒“基本上是宗派主义的”。鲁迅认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不能武断地说，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先给别人预备一个罪名，企

图以此“统一作家”，这倒是十足的宗派行帮理论。其次驳斥所谓“标新立异”，鲁迅指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为了组织更广泛的抗日力量，同时也容许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为贯彻革命路线，“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再次鲁迅斥责周扬、徐懋庸之流所“了解”的什么“基本的政策”，什么“实际解决”等等，无非是他们的“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指出他们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鲁迅并根据他长期斗争的经验，断定周扬、徐懋庸等是“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四条汉子”和徐懋庸辈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罪恶历史，完全证明了鲁迅这一科学的论断。

（三）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累累罪行。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鲁迅就尖锐地指出：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一方面是为了吞并中国，另一方面是企图进攻苏联，奴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第一步。（《答文艺新闻社问》）在《‘友邦惊诧’论》中，指出帝国主义所操纵的“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在《不求甚解》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提出所谓“和平宣言”、“禁止各国军队越出国境”，但“注释家”却说，“美

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不在禁止之内，揭穿了美帝假和平，真侵略的反动实质。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一面高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一面又以“缩短防线，诱敌深入”为名，丧失大量的国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罪恶勾当。在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所谓“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时，鲁迅写了《文章与题目》一文，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安内急于攘外”，实际是“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的反动投降卖国政策。他如《战略关系》揭露了国民党引狼入室，卖国投降的罪恶本质。《天上地下》揭发了敌人与日寇伙同一气轰炸中国内地，轰炸苏区的滔天罪行。《电的利弊》、《写于深夜里》等杂文，控诉了国民党特务匪徒用法西斯手段镇压革命人民的残酷罪行。

（四）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它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又利用一批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进行文化“围剿”。这批走狗文人的猖狂进攻，都被鲁迅用投枪、匕首式的杂文所一一粉碎。如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提倡“人性论”的“新月派”，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而打着超阶级的“人性论”的幌子，替国民党“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梁实秋不过是一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如以王平陵为代表的主张“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鲁迅揭露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实则是“洋大人的宠儿”，是一些“沉沉浮浮的流尸”，他们只能为他们的主子“尽些送丧的任务”。又如以苏汶、胡秋原为代表的“第三种人”和“自由人”，主张超阶级的“文

艺自由论”，鲁迅戳穿所谓“第三种人”，不过是资本家的走狗所“心造的幻影”，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第三种人”的。至于所谓“自由人”的“文艺自由”，则是在敌人“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论“第三种人”》）通过深刻的揭露，鲁迅撕破了他们玩弄马列主义词句的伪装，暴露了他们资产阶级忠实走狗的原形。国民党反动派除了豢养一批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对革命文学运动进行“围剿”之外，他们还采用“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等法西斯手段，来镇压革命文学运动。但这并不能说明敌人的强大，恰好表现了它的腐朽和虚弱，正如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所揭发的，反动的统治阶级“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产生，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作对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左翼文艺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反动派已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鲁迅后期的杂文是以阶级论为指导思想进行创作的。它的战斗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上四个方面，他如对提倡幽默，主张闲适，创办《论语》，专写使“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的小品文的帮闲文人林语堂，对自认为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后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张资平，对主张青年读《庄子》与《文选》，在“古书中寻活字汇”的新遗少施蛰存，对主张“词的解放”，宣扬“国家事管他娘”，

的曾今可，对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的叛徒杨邨人等，鲁迅用他那横扫千军之笔，都毫不留情地一一加以扫荡。此外，鲁迅在这时期，对于文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大众语和拉丁化的创立，木刻和连环画的提倡，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方法，翻译工作的原则，文学遗产和旧形式的批判继承，以及对于青年作者的教育和培养等等，都用杂文的形式，发表了许多有独创性的精辟的见解，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曾多次提倡阅读鲁迅的杂文，并对鲁迅的杂文作了科学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即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延安《解放日报》第一次公开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热情地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今天，我们学习鲁迅的榜样就要认真学习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从中学习鲁迅战斗一生的革命斗争精神。特别要认真学习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鲁迅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宝贵经验。鲁迅战斗的一生，经历了历史上革命斗争的成功和失败，高潮和低潮、聚合和分化、极“左”和极右的多次巨变。从辛亥革命前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三次大分裂，如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裂；如五四后期“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如大革命失败后，“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但鲁迅在这“风雨如磐”、“黑云压城”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始终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与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斗，与钻进革命营垒的“蛀虫”斗，把他那支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反抗着，呼啸着前进。他在黑暗势力的侵袭中，的确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这种革命的坚定性，是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也是他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最宝贵的经验。后期的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这把锐利的解剖刀，解剖一切。他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的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带有阶级性的，“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痼疽，是他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用阶级论这把解剖刀，解剖了那些所谓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揭穿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和欺骗，也识破了钻进革命阵营内部，表面上是“战友”实际上是“三翻四复的暗探”，是“狮子身上的害虫”的周扬等“破落户的漂零子弟”。所以“知人论世”，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看待一切是鲁迅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又一宝贵经验。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也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战斗风格。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他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的斗争精神。当我们党内第一、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时，一些在错误路线影响下提倡“革命文学”的人，对鲁迅实行“笔尖的围剿”，给鲁迅扣上了“封建余孽”，“有闲阶级”，“落伍者”乃至“法西斯蒂”等等大帽子，企图压服他，但鲁迅力拒狂浪，坚决顶住，指出这些“指着自己的鼻子，惟我是无产阶级”的“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而他们的“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当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时，他的追随者周扬之流，为了推行王明、刘少奇的投降路线，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同样对鲁迅“大布围剿阵”，他们以党的化身、“领导者”自居，对鲁迅极尽造谣、诬蔑、攻击之能事，什么“宗派主义者”、“托派”、“转向”、“标新立异”等一大堆帽子，雪片似地飞来，但鲁迅砥柱中流，顶住恶风，尖锐指出“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投降敌人的“招牌”，而且写了批判“国防文学”的著名论文，“投一光辉”，就使周扬等“四条汉子”“伏在大纛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又一条宝贵的经验是解剖敌



人，重视反面教员。八股文是“阴面的战法”。鲁迅说：“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当面”的敌人，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公开的明火执仗的敌人，一种是暗藏的和钻在革命营垒内部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都是革命人民的反面教员。鲁迅曾经打算把敌人向他进攻的文字，分别编为《围剿集》或《十年围剿》，作为反面教材，以见敌人各种反革命策略和伎俩之一斑，解剖、研究它们，作为对敌斗争的弹药。特别是对反革命两面派的斗争，鲁迅对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对付这伙人的办法就是识破它，揭穿它。鲁迅说：“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对于那些“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的伪君子、两面派，鲁迅告诫人们，不要只看他们“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大文”，而要看他们“阴面战法的五花八门”：他们“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我们知道，被敌人攻击为“一条尾巴”的《伪自由书·后记》就专门收集许多反面教材加以评注，揭穿敌人的各种反革命策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教育青年一代怎样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最生动的教材，正如鲁迅所教导的：“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就是“袭用”了阶级敌人的“老谱”向无产阶级专政猖狂进攻的，我们读鲁迅这份

珍贵的“记录”，的确可以更明白骗子们是一些什么东西的。

第二，学习鲁迅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典范。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革命的辩证法象一根红线贯串在鲁迅后期的杂文之中。鲁迅用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大肆宣扬什么“好人政府”、“王道”、“人权”、“博爱”、“平等”等谎言来粉饰太平，欺骗人民时，鲁迅曾尖锐地指出“饱人是不会爱饿人的”。在《听“说梦”》中鲁迅更进一步揭穿了种种谎言：“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并明确地指出，“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至于所谓“王道”政治，鲁迅指出这不过是买办文人胡适向敌人献出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一剂“新药”而已。他说，在中国所谓“王道”，却是“霸道”的兄弟，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反革命两手，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因此鲁迅断言：“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这就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力地揭示了这种“妄言”的欺骗性和“新药”的毒害性。鲁迅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还批判了那种认为“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的“纯而又纯”，貌